



引用格式:张爱军,方凯. 互联网环境下网络政治传播与公众情感表达探析[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1(1):83-88.

中图分类号:D08;G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0.01.011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1-0083-06

互联网环境下 网络政治传播与公众情感表达探析

Analysis on network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emotion expression
in the context of Internet

张爱军,方凯

ZHANG Aijun,FANG Kai

西北政法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科学技术不断革新的时代,信息传播逐渐依赖于互联网的延伸,这使政治信息的网络传播成为当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渠道。网络政治传播所包含的内容多种多样,正确的政治传播对于增强政治认同感、维护政治文化安全等具有重要作用。研究发现,网络舆论场中的话语表达和舆论走向与公众的情感倾向存在相关性,而公众情感因其抽象性、内隐性的特点容易被忽视或难以做出分析。基于政治传播与公众情感相关性的研究视角,研究认为,适用于当下网络环境的情感表达引导路径为:建立理性自律的教育机制,建立适应现代网络政治传播的制度规范体系,建立适应网络政治传播的公平正义体系,重视首因效应。

关键词:

情感;
网络;
政治;
传播

[收稿日期]2019-03-06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8BZZ017)

[作者简介]张爱军(1962—),男,辽宁省大连市人,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网络政治传播;方凯(1987—),女,山东省潍坊市人,西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网络政治传播。

现代政治传播中,互联网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传播渠道。网络政治传播涉及政治传播的主体、媒介和受众,媒介是沟通信源主体与传播受众的纽带。与传统媒介不同的是,网络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具有虚拟性,无论是从政治主体到受众的传播还是受众之间的传播,事实上都是一种思想和精神的交流。大家互不相识,不能面面相觑,只能通过文字、图形、音频、视频等方式进行交流,这必然会减少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的沟通,导致网络政治传播的信息内容、方式手段、目的等因素变得愈发多样。而公众的情感倾向同样因其具有与网络相似的抽象性、内隐性等特点而容易被人们所忽视或难以做出分析,但是它的影响不容小觑。鉴于此,本文拟在探讨网络政治传播的主要内容和网络政治传播生态中公众情感的普遍特质的基础上,分析公众情感表达对网络政治传播的影响,提出网络政治传播中公众情感表达的引导路径,以期网络政治传播的有序和规范提供启示。

一、网络政治传播的主要内容与独特价值

传播学认为,传播环境的改变会引起传播内容的相应变化,互联网的公开性、及时性使得政治信息的网络传播与传统媒体的传播有所不同,其传播信息的范围更广,对更新速度也有更高的要求。要实现一种社会范围内的公序良俗,政治信息的有效传播极为重要。网络政治传播以其鲜明的传播特性、独特的传播内容成了当下政治传播的重要途径。“互联网+政治”顺势而生,应时而为。

1. 网络政治传播的主要内容

关于现代网络政治传播的内容,荆学民^[1]曾以一个圆作为比喻。他指出,在政治传播内容中处于结构表层的是意识形态,处于结构中层的政治价值,处于结构核心的则是政治文

明。三者层层递进,由表及里构成了一个坚实的政治传播内容框架。

其一,网络政治的意识形态传播。意识形态是一整套构成政治—社会纲领的判断、理论及目标,经常伴随着人为宣传的含义。立足中国,意识形态传播的核心就是关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包含的政治理念和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这中间伴随着有关国计民生、社会文化等方面发展的动态与方向的传播等。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其所著的《文化的解释》中,提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命题:“正是通过建构意识形态即社会秩序的图解式的形象,人使自己成为难以预料的政治动物。”^[2]这一观点与亚里士多德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的论断不谋而合。人总是不自觉地参与到政治事务中去,并通过政治理念的传播潜移默化地影响大众,以增加政治框架的凝聚力和社会大众的认同感,从而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其二,网络政治的政治价值传播。政治价值是建立在现实政治生活基础上的面向理想政治生活的诉求,是基于当下我们政治生活框架的不完备之处,对于未来想要达到的政治面貌的描绘和期盼,如政治理念、政治结构、政治制度等,其中政治的基本价值应该是依托于自由、平等、博爱等基本因素,以民主、法治等基本的政治制度为导向。

其三,网络政治的政治文明传播。追求文明、倡导文明是整个世界发展的一种愿景和趋势。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现需要以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实现作为基础。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主要包括政治制度和政治观念两个方面的内容。

2. 网络政治传播的独特价值

数字媒介的应用极大地丰富了国家政治传播的方式,为人们更大程度地参与政治事务提

供了方便,使得政治主体与社会大众之间的沟通由政府到大众的单向信息传递转变为政府与大众之间双向互动的信息沟通。网络的便利性与透明性也激发了人们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有利于打破信息不畅的藩篱,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保障国家政治文化安全。

其一,有利于澄清网络政治谣言,压缩网络政治谣言的生存空间。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深度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逐渐凸显,诸如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官员腐败、公众对于公平正义的诉求等越来越突出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网络技术的发展在带来传播范式更新的同时,也为基于各种社会矛盾的网络政治谣言提供了生存和传播的广阔空间,网络恶意政治谣言的散布传播,极易引发规模化的集体行动,导致社会动荡,扰乱社会秩序,进而引发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危机^[3]。而透明、规范、真实、有序的网络政治传播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澄清谣言,有效传递正确的政治文化观念,促进政治文化健康发展。

其二,有利于民众接受正确的政治观念、培养其健康的政治情感。国家的政治理念、意识形态等通过互联网迅速传达给大众,有利于构建公众正确的政治认知,强化公众的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

其三,有利于捍卫国家政治文化主权。网络的互联共通性也为境外反动分裂势力利用网络传播西方腐朽文化、捏造针对社会主义中国的负面信息提供了便利,其经常会利用网络对我国党和政府进行攻击,向国内不明真相的网民进行误导性宣传,抹黑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大肆宣扬资本主义的腐朽文化,严重影响了我国政治文化安全。网络政治信息的有序传播,有利于完善信息过滤机制和实时监控预警系统,促进网络政治传播健康发展,捍卫我国的政治文化主权。

二、网络政治传播中公众情感的普遍特质与作用

通常来说,情感是隐性的,只有通过语言、表情、动作、文字等的呈现才可以被识别。网络政治传播中,落地的文字评论、表情符号是人们对于某些政治信息的态度反馈,换句话说,就是网民内在情感的一种倾向性表达。

1. 网络政治传播中公众情感的普遍特质

其一,盲目从众性。一般来说,情感是私密、排他的,属于个人体验,难以与别人分享。在网络政治舆论生态中,社会大众往往会借助日趋发达的媒介平台传播、分享政治信息,但网络的虚拟性和个体的隐匿性,极易促使大众由个体自动站队形成网络群体,迅速地形成网络风暴,造成强烈的舆论冲击力。例如,近年来网络大V发布虚假消息造谣生事或谋利,都会吸引众多粉丝和网友参与其中,从而混淆视听,扰乱网络秩序。再如,知名人士利用网络亲友团发布攻击他人的舆论贴,给后者造成舆论压力,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以上事实都说明,网民具有较强的盲目从众性,在网络中极易受到意见领袖的思想误导或精神操控。

网民情感的盲目从众性具有多方面的原因。网民因其自身的性格、年龄、生活环境、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类型等差异,对同一现象经常会持不同看法,且其观点往往是根据自身的直接经验得出的。古斯塔夫·勒庞在其《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一书中指出,群体成员的主要特点是无意识的人格战胜了有意识的人格,开始支配人的感情和行动,暗示和传染会让这些感情和行动都转为同一个方向,人从个体变成群体成员^[4]。盲目从众使得群体的智力低于孤立的人的智力,使得人们缺乏对于事物的理解、分析和判断能力,经常受困于表象。

其二,反复变化性。网络时代,事实似乎正

在失去其支配社会舆论的力量,由此引发的一种非常普遍的感觉是社会已经进入“后真相”政治时代。事实被情绪所裹挟,人们急于自己情感的表达、宣泄,忽视事件背后的真相。说到底,“后真相”的问题就是情感的问题。新闻不断反转,公众在这个过程中情感走向跟随着不同时刻暴露出来的新闻事实不断发生变化,同时每一次情感表达的涌现又再一次将舆论炒热,引发新一轮讨论,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

公众情感的反复变化源于非理性的情感宣泄。“情感”一词本属心理学范畴,属于态度的一部分。通常人们认为情绪的变化性大,而情绪累积的结果就是形成特定主体对于某个事物的情感。实际上,人的情感也是反复无常的,具有不确定性,这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分析。人的情感易变的内在原因就是人性的易变性,正如休谟在《人性论》中曾指出的,人性的要素就是易变性^[5];人的情感易变的外在原因就是信息的碎片化生产和碎片化传播无法兼顾时效性和完整性,受众接受到的往往都是零碎的片段式的信息,造成了信息模糊。受众对于特殊群体的刻板印象会直接影响到其对事件的理性认识。现在的媒介传播平台和传播渠道多种多样,大众接触信息的途径也多种多样,“后真相”时代的情感宣泄,反转新闻事件的层出不穷,以及信息传播的失控,都会刺激公众情感的变化。

其三,欺骗性。虚假的情感可能会更有利于保持热烈的关系,心理学家将之称为“欺骗性的情感”。在男女朋友关系中,双方互相表达的爱意很多具有不易察觉的欺骗性,但这不是欺骗;也不表明爱意欠缺,而是掺杂有一部分夸大成分。网络政治传播所说的情感欺骗体现在政治活动与现代新型传播媒介的深度融合过程中。受众出于各种原因,如害怕坚持自己的看法而被孤立,亦或想体现自己在某个群体中

的价值而标新立异,从而做出特别支持或极力反对的一些可能与真实情感不符的举动,使自己的情感体现出欺骗性。

“好人主义”价值观的蔓延是情感具有欺骗性的主要原因。由于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们自身的活动与政治的关系也愈加密切,想要“独善其身”是很困难的。对于涉及政治的活动,群体成员会最大限度地维持群体的利益,避免不和谐,不想因此发生冲突,更不想“出类拔萃”,这也是出于一种情绪管理的需要——这样大家都会相安无事。群体中的成员跟风表达意见的时候,容易被过度解读,从而呈现出“特别支持”或“极力反对”两种对立的预见性倾向。比如,对于某些落地前的政策,大众的看法本应是“不错”“可以”“挺好的”等略带倾向性的评价,但在实际中往往会演变成“特别好”的一种毫无瑕疵、特别完美的形而上体验。网络政治传播所特有的虚拟性,会使一些在现实生活中敢怒不敢言的人变成网络愤青,利用语言暴力来表达自己所在群体的政治或生活诉求,力求得到主流社会的关注与满足,这种功利主义的网络传播,是潜在危险引起群体极化的反应。

2. 网络政治传播中公众情感的作用

公众情感表达对网络政治传播有积极的作用。其一,公众情感表达对网络政治传播有很好的反馈作用。公众情感的表达往往会反映公众话语的方向,其对具体政策的支持或反对,对网络政治传播方式的喜好或厌恶,都可以作为网络政治传播效果的反馈。信息发布主体可以根据公众情感反应的程度,广泛收集有价值的信息,及时地调整政策。其二,公众情感在网络政治传播中的表达,对各项政治目标的完善具有启示作用。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于政治传播主体释放的信息信号,大众话语会呈现出大量的回馈信息,利用大

众群体的智慧力量,政治传播主体可以学习到或挖掘出更加完善的方式方法,从而为以后的政治传播打造一个发展框架。

公众情感表达对网络政治传播也有负面作用。其一,公众情感的无序表达对错误的、不真实的政治信息的传播具有扩散作用,也就是网络谣言的增殖。网络因其虚拟性的特征,是谣言萌芽和生长壮大的理想温床,而网络传播的受众因正确信息传播渠道的不畅通或传播的时效性差等因素极易形成信谣、传谣的集体行动。谣言的肆意传播,会压制正确的、真实的政治信息的传播,使民众信谣为真,引起恐慌,不利于社会稳定。其二,因情感不稳定性和私密性,很难确定情感主体内心的真实感受是否与其所表达的观点相一致,这在明确需要以定量的大众反馈样本为参考的一些调查中极易导致调查结果的偏差。尤其在政治传播领域,民意测评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虚假型或伪装型的“公共态度”会使政治传播的效果大打折扣。

三、网络政治传播中公众情感表达的引导路径

互联网环境下,人们表达观点的自由度提升了,内心情感需求可以更充分地释放。在此过程中,如果监管措施不到位,难免会出现非理性状态下言语过激的谩骂、污名甚至唱反调的造势行为,进而可能形成网络舆论,极大地影响网络政治传播的效果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规则框架下的自由表达、理性的情感宣泄,是互联网政治传播的善治之路,但是,规则、理性、善治的实现,取决于正确引导。

其一,建立理性自律的教育机制。应把长期教育目标与短期教育目标相结合。长期教育目标是以学校为基本阵地,培养学生推己及人、乐于助人、积极践行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

务的意识;短期教育目标则是教育网络公众在表达情感时先进行自我反思,以鼓励大众参与政治事务为根本出发点,培养其同理心,引导其进行合理的、有节制的情感表达。

其二,建立适应现代网络政治传播的制度规范体系。良好的制度规范体系能够有效地约束公众情感,防止公共情感极化。良好的制度规范体系的基本指标是法治。法治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是限制公共权力,防止公共权力滥用,做到法无授权不得行,并同时使公共权力为民众提供有效的服务;另一方面,保障公民权利,防止由于公民权利的极化和滥用而危害社会。

其三,建立适应网络政治传播的公平正义体系。罗尔斯认为,公民行使政治权利应该符合宪法的基本要求,同时情感规则的建立也应符合宪法的基本理念价值^{[6]145}、符合公共理性,不与公共理性冲突,因为公共理性具有独立性。公共理性这种独立性的正义,能够引导公共政治中的多元理性讨论和对于制度原则的忠诚^{[6]29,31}。

罗尔斯的公平正义体系,是针对西方国家的,对中国不太适用,但对于网络政治传播则具有一定的启发性。网络政治传播不同于现实政治传播,但它是现实政治传播的延伸和变异,二者有同有异。从变异的角度来说,网络政治传播需要不同于现实政治传播的网络公共理性、网络公平正义、网络政治情感。网络公共理性需要取得网民认知的多元共识,从而约束非理性的言论,使得理性多元成为网络正常生态。网络政治情感需要找到多元的宣泄口和减压阀,维持网络政治情感的平衡,而这需要网络公共理性与网络公平正义的双重导引,并以公平正义的制度体系作为支撑。

其四,重视首因效应。传播学中存在一种首因效应,也叫“第一印象”效应,指人们对于

最初获得的信息印象深刻、不易改变,甚至会左右对后来获得的新信息的理解。当网络中出现重大舆情尤其是出现关系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件时,政治传播主流媒体应及时发声,客观真实地报道事件以引导舆论,缩小公众可以揣度和臆测的空间。这样不仅可以从源头上遏制网络谣言的传播,净化网络舆论场,同时也能在突发事件出现时,利用网络的快速传播力,做到线上线下积极响应,齐心协力共同应对。这也是新闻时效性特征的一种体现。而且积极的、正面的情感表达可以积蓄为一种高度的情感渲染,促使社会大众形成一种认同感,可以有效地推动互联网中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四、结语

加拿大政治经济学家哈罗德·伊尼斯在《传播的偏向》一书中写道:一种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诞生。在新媒体环境下,信息的传播呈现出即时性、互动性、公开性等特点,政治传播也在互联网的信息传播方式的影响下诞生出新的政治传播方式。这其中,公众情感的表达越来越成为影响网络政治传播走向的重要因素。在互联网语境下要实现政治文

明,必须重视公众情感、公众意志的表达,这不仅要求我们要保证畅通的表达渠道,不要让高压的舆论环境作用于受众孤立恐惧的心理,形成“沉默的螺旋”^[7],同时更要求我们要注重公众意见的反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双向互动。

参考文献:

- [1] 荆学民. 关于政治传播内容的理论思考[J]. 南京社会科学, 2016(3): 109.
- [2] 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韩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1999: 260.
- [3] 张爱军. 论网络谣言的治理策略[J]. 行政论坛, 2016(5): 8.
- [4] 勒庞.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M]. 严雪莉, 译.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1: 11.
- [5] 休谟. 人性论[M]. 贾广来, 译.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 198.
- [6] 罗尔斯. 政治自由主义[M]. 万俊人,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0.
- [7] 上官酒瑞. 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认识论分析[J]. 求实, 2018(6): 36.